

?化：新事物到旧体?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Domesticate : new things and the Chinese-Style Poetry
著者	潘 ?宝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文化交渉 :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Asian Cultures :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
volume	1
page range	123-133
year	2013-01-31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9857

归化：新事物到旧体诗

潘 德 宝

Domesticate : new things and the Chinese-Style Poetry

PAN Debao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s set to illustrate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western new things represented especially by the Expo since the 19th century, which epitomizes its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framework. Second,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ystem of objects and its frame of thinking, show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Finally, to explain the role played by Japan in the naturalization progress from western things to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ry, as an intermediary agent in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 words: 归化；新事物；旧体诗；黄遵宪；森春涛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曰：“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称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透逗出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所谓的“影响的焦虑”，面对古典传统无远弗届的影响，历代诗人欲超越古人而自成一大家者，即便没有忧郁成疾，至少也是焦虑不已，正是这种“焦虑”会激发诗人去开辟新的世界。它是推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内在力量之一。

“不为古人所束缚”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古人所未见之题材入诗，黄遵宪曰：“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¹⁾甚至说：“独于纪述外国之书，则世愈近者书愈佳。”²⁾19世纪中期以来，东西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比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出现大量的西方新事物，为汉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题材。所以日本人川田甕江（1830-1896，号毅卿）在《东京才人绝句》的序言中说：“昔者咏物，花鸟风月，而今则石室电机，汽车轮船，耳目所触，无一非新题目。”³⁾1870年代，黄遵宪等中国诗人东游日本，身经目击，颇有心得，所做诗文也广邀盛誉，如黄遵宪被称为“诗界革命第一人”、“诗界之哥伦布”。他们的海外经验，正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外在契机。

但是，海外新事物与中国传统诗歌之间枘凿方圆，强行捉置一处甚至还会产生“诡异”之感，正如黄遵宪在《致胡晓吟函》已经感知的那样：“遵宪居日本五年，在金山四载，今又远客英伦，五洲者历其四，所闻所见，殊觉诡异，有《山海经》、《博物志》所不详者。”⁴⁾因为这涉及两个文化体系的交涉。首先，海外新事物并非只是一个新名词、一桩新事实或一件新器物，新事物背后涉及西方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意识形态。其次，中国传统诗歌关于“物”，也形成了“物类”或“物体系”，自有渊源，如黄遵宪所提示的《山海经》、《博物志》。所以，新事物与旧体诗的交涉，背后是两种文化的交涉，两种思维框架的交涉。

本文首先说明西方新事物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博览会为代表，集中体现了其文化、思想框架。其次，对照中国传统的“物体系”，及其思维框架，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最后，说明日本作为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涉过程的中介，在西方新事物向中国旧体诗“归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博览会中新事物象征着文明开化

博览会的历史甚早，其中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规模空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后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也相继举办万国博览会，至二战结束前近一百年时间，是博览会举

1)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3页。

2)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6页。

3) 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词华集·日本汉诗》第八卷（汲古书院，1983年），463页。

4)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345页。

办的高峰期，全世界至少举办了两百次以上的大型博览会。世博会作为一个缩影，体现出整个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体现。

明治时代的日本，学习西方，目光常聚于此，而博览会成了一条通向西方的桥梁。日本不但参加而且举办各种等级的博览会，自1873年维也纳博览会之后，日本在明治、大正期间，共参加44次国际性博览会，其中16次为规模最大的万国博览会。在参加国际博览会的同时，日本也开始自行举办国内博览会。显然，博览会已经成为当时日本国内产业、经济、政治、文化向西文学习、以及重建知识体系、乃至文明象征的重要场所⁵⁾。

自1876年参加美国费城博览会之后，1877年8月21日日本又在东京上野公园内举办“第一回内国劝业博览会”，而黄遵宪1877年8月26日抵达长崎，因此黄遵宪等人可以直接接触西方新事物，甚至可以直接感受新事物背后的文化体系。

第一，分类与标准化暗示着文明开化的追求。

博览会上展出的物品需要分类，松冈时敏（1815-1877，号毅轩）《上野博览会杂咏》序云：“内国劝业博览会，设于上野公园，造屋数百楹，中央向南曰美术馆，左曰东本馆，次曰农业馆，右曰西本馆，次曰机械馆，更有动物园艺二馆。府县各出其任土，陈列品物，不胜枚举。故区以揭其纲，类以举其目，虽洪纤交备，不敢混位置，使览者瞭然得穷其精微，盖博览本旨在劝民以业，殚智尽力，裨补造化，而内务省统辖其事，审查官鉴裁精否，叙其等级，早禀省卿，给以赏牌，建内国富盛之鸿基，莫兹为先。”⁶⁾

展品分区就是对物品的分类，“叙其等级”就是作比较。博览会中的分类与比较，事实上就是一次知识框架的重构过程。简言之，某种植物，在《诗经》中的位置，不一定是《本草纲目》中的位置，更不一定是博览会中的位置，同一种植物会因为不同的位置而呈现不同的意义与价值。而上野博览会上的分类，则显示了当时日本追求文明开化的心理，以西方的标准重新整理已有的知识框架。因为这个分类是模仿前一年费城博览会的分类法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发展成了其主轴，这个主轴支配了分类的中心；其次，“叙其等级”则要建立制度，也是从另一个方面支援着“进步”文明开化思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博览会中的物不只是静静地展出，还隐含着与“观看者”互动——“使”览者瞭然得穷其精微——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的意味，表现出现代文明有种裹挟一切的力量。

第二，物品与文明程度的绾结，物品的精美度与国力相等同。

早期世博会关注制造与艺术两大内容，当时欧洲人认为，这两者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机械馆和艺术馆是世博园中最醒目的展馆。费城博览会的场馆分布，以

5) 日本关于博览会的研究，可以参看吉田光邦《万国博览会》（改订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5）、吉见俊哉《博览会的政治学》（中公新书，1992年）、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览会と異文化表象》（吉川弘文馆，2003）、国雄行《博览会と明治の日本》（吉川弘文馆，2010年）等。而吕绍理《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则介绍了日本以海外举办的博览会，值得参考。

6) 森春涛编《新文诗别·上野博览会杂咏》（茉莉巷凹处，1877年），1页。

7) 国雄行《博览会と明治の日本》（吉川弘文馆，2010年），95页。

直观的方式展示出了物品所属国的国力。有当时中国人李圭的记录为证：“进南门至中道止，东首皆美国地；西首德、奥二国地最大，日本次之，……。进北门至中道止，东首法国地最大，……；西首英国地最大，约居十之六，俄国次之，……”⁸⁾

这里物品的陈列不仅与国力成正比，郑毓瑜还指出：“这些展品与‘原料’端的远近，同时也就成为国家或种族‘进步’或‘退步’的指标与对照表。……当费城博览会，是依循这个科学家的分类设计来呈现国家或种族分界时，其实就已经从‘进步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变成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an idea of progress)，科技性的工业成长，就这样与种族或国家的评比相互牵连。”⁹⁾

而东京的上野博览会，完全模仿了费城博览会的思想或者说“进步的意识形态。”只不过将万国博览会的国家间的竞争，转换成府县间的竞争¹⁰⁾。但随后就将这种观念远输海外，进行殖民成果的展示。可以说，物品特别是西方新事物，随着博览会而传播到东方，随着物品而来的是西方的那一套“进步的意识形态”。

总之，在这种博览会所展示的意识形态下，新事物所联结的世界，是文明开化的世界，是机械文明的世界，是民族国家进步的世界。

二、中国传统物类与连类感应

而中国传统的物类观念，则与西方新事物、新事物的分类、新事物背后的意识形态迥然不同。中国的原有的物体系是一个连类感应的世界¹¹⁾。

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看，古人有“气感类应”的思想。《淮南子》中以气的聚散来说明万物的生灭变化¹²⁾。《天文篇》云：“道始于虚霏，虚霏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为地。”¹³⁾《地形篇》云：“土地各地其类生”¹⁴⁾万物皆由气生，天、地、人是同质的，因此才有了感应的能力，所以“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麒麟鬪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¹⁵⁾明显地表示出把全宇宙的构造体系化为“气一元论”的意图。

8)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217-220页

9) 郑毓瑜《1870年代中、日汉诗人的视域转换——以博物知识、博览会为认知框架的讨论》(台湾《淡江中文学报》，第二十五期，2011年12月)、122页。

10) 国雄行《博览会と明治の日本》(吉川弘文馆，2010年)、95页。

11) 参看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一书及氏著相关论文。

12) 按：这种思想的来源很久远。参见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编，李庆译：《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165-166页。

14)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338页。

15)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172-177页。

中国魏晋时代发展出的抒情观念，就是与这一套宇宙模式相适应。花草鱼虫、四时八方都可能与情志发生感应。这不是“借景抒情”所能概括的，情志与景物早已经暗通款曲，时与事、物与我之间早已认可熟悉，而且时时处于类应（类固相召，气同则合）的状态。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何以可能的原因。

举例来说明。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一四首《新历》：

纪年史创春王月，改朔书焚夏小正；四十馀周传甲子，竟占龟兆得横庚。¹⁶⁾

此诗中“春王月”典出《春秋》鲁隐公摄政之始，称为“元年春王正月”，是说明鲁国奉行周天子颁布的朔政¹⁷⁾。《夏小正》为《大戴礼记》中一篇，记录可以表征节候的事物，及直接与农业生活有关的事情，但后来逐渐发展出与政治的联系¹⁸⁾。“横庚”事见《史记·孝文本纪》，汉孝文帝为代王时，众人诛诸吕，拥立代王，并卜得龟兆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¹⁹⁾，意为代王自诸侯而即帝王位。“春王正月”、“改朔”、“焚夏小正”都指向一个意象“横庚”，即改朝换代。

但是，明治五年的改用新历，并没有改朝换代，只是为了让时间更为精确。正如前述博览会所呈现的“新事物”观，新历无关乎政治，无关乎改朝换代，它不与旧体系有什么联系，新历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全球时间得以一致，简言之，新历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面小镜子。从知识的层面看，黄遵宪显然是理解西方的新事物所呈现的观念，《日本杂事诗》初印本第一首《新历》：

梧桐叶落闰难知，萁荚枝抽不计期；只记看花携酒去，明朝日曜得闲时。²⁰⁾

此诗中的“梧桐”、“萁荚”这两个物，并不只是诗人秋季所见之物，他们都出自类书《太平御览》，梧桐出自卷九五六《木部》五《桐》：“（梧桐）每枝生十二叶，一边六叶，从下数一叶为一月，有闰则十三叶，视叶小处，则知闰何月也。”萁荚出自卷八七三《休征部》二《萁荚》：“有草荚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荚，月半而生十五荚，十六日以后日落一荚，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荚焦而不落，名曰：‘萁荚’，一曰‘历荚’。”这是强大的物类记忆，黄遵宪创作诗歌时，依然使用、调动旧知识框架中的语词。以“连类”的植物来表达计时的概念。但是，从现代新事物的认知上看，黄遵宪也清楚地知道“闰难知”、“不计期”，这就显示了旧体系与新事物之间的矛盾，两者的巨大鸿沟，正是东西文化在旧体诗中交涉的表征。

这里要说明的是，日本汉诗人也是共享着这个物类体系的。虽然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新事物大量涌入，但旧体系并未退去，且不用考察俞樾所编《东瀛诗选》，就专看明治十年左右的汉诗就可以知道。森春涛（1819-1889，名鲁直，字希黄）明治改历时作有《新历谣》四首，其中第三、四两首如下：

16) 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注校点《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603页。

1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6页。

18)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8-12页。

19)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414页。

20) 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注校点《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604页。

春入杏花红未酣，轻寒脉脉雨氤氲。新来燕子应相讶，江上已过三月三。

四月方看寒食花，中秋正见下弦娥。几回繙历检诗料，添得虽多减亦多。²¹⁾

杏花、燕子本来都是节候的象征，对照新历，自然轩轻不合。寒食、中秋都是联结着具体的时间，但用这个时间来印证旧时的月色，往日的花草，自然格格不入。之所以新历与物候有相违之感，因为诗人还是秉持着旧体系的思维框架。旧体诗的物类框架，的确是带着强大的文学记忆的，所以翻看日历，希望从节序上寻找诗料，可是这样的节序虽有增，但是“减亦多”。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参见森春涛所编写的《新文诗》、《东京才人绝句》、《旧雨诗钞》等。

三、新事物的归化与明治汉诗人

明治汉诗人在新事物与旧体诗的关系上，他们采取了“归化策略”，“归化”原为入籍的旧称，后来借用作翻译术语。归化翻译是指以目的语为归宿的翻译策略，即采用目的语文化所认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规范，使译文流畅、通顺，以更适合目的语读者²²⁾。将“客籍”的语言，纳入归宿语言之“籍”，如英译汉的归化翻译就让译文尽量地汉化。本文借用该词，指19世纪70年代以来，海外新事物通过诗人的努力，加以适当的理解或有意的误解，最终融入到中国古典诗歌知识体系，犹如新事物“入籍”到旧体系。

中日两国诗人都试图求新求变，但这个变是有基础的，他们不愿也无法离开旧体诗的传统，所以他们采取归化策略，将新事物从西方文化体系中抽离出来，归化到旧体诗的知识框架中去。将西方新事物归化到汉诗旧体系的，日本明治汉诗人做了有效的尝试。如成岛柳北出国时写了很多汉诗，“幡然游历大西洋”，中国在日教习叶炜评论他的诗风变化时说：“归来文字誇一变，不注寻常经与传”²³⁾，的确道出了西洋新事物对明治汉诗影响的一个侧面。

如小野长愿《养蚕杂诗》云：“蚕事始与神圣世，岁如其盛见天心。人生最切衣将食，莫忘先王垂教深。”²⁴⁾ 这就可以知道，旧体系中，养蚕与王教联系在一起的，蚕，不只是鳞翅目的昆虫，如《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五“蚕”条，《佩文韵府》卷二十八“蚕”条，都显示蚕桑与后妃之德、先王垂教联系在一起的，象征着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和伦理意义。到了松冈时敏《上野博览会杂咏》中《制丝机器》：

煮茧鼎沸疾，缲丝轮转亟。地中藏汽机，巧妙难窥测。流芳传东土，出蓝轶西域。百功成一瞬，满场皆动色。上奖后宫美，可以懋坤德。下省民家忙，可以效妇职。蚕事如是盛，安不富皇国。妇女百年劳，机关半日力。²⁵⁾

21) 森春涛《春涛诗钞》卷十一（文会堂，1912年）第十四、十五页。

22) 朱安博《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科学出版社，2009年4月），4页。

23) 叶炜《赠成岛柳北先生戏效张船山体》（森春涛《新文诗别集》第五集，茉莉巷凹处，1876年，第十六页。）

24) 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词华集·日本汉诗》第八卷（汲古书院，1983年），432页。

25) 森春涛《新文诗别集》第九集《上野博览会杂咏》（茉莉巷凹处，1876年），第一页。

诗歌中描写煮茧制丝机器的效率，中间加入“后宫”、“坤德”，就是传统记忆的奇妙作用，即便使用了表示工业产能的效率的先进工具时，他们的意义阐发，仍依附于旧的体系。

不过，日本诗人将新事物归化到旧体诗，显然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很少能既突显新事物又照顾旧体系。如成岛柳北《航西裸诗》在当时即相当有名，主要是被认为吸收西方新事物、新观念入旧体系比较成功，请看下面这首：

层阁钜竞繁华，百货如邱人语华。此际谁来买秋色，幽兰冷菊几盆花。²⁶⁾

郑毓瑜文章认为，这里先写市街繁华、人声喧闹的场面，而突然来一句谁买秋色，并以幽兰冷菊来结句，表示虽然幽兰、冷菊不敌百货，但也暗示了高楼、百货无法应照或兴发三秋的季节氛围。如果没有诗中自注“香港”二字，则此诗“并没有一般传颂的‘航西’的视野与风情”，反倒明显依循传统来悲秋与怀乡”²⁷⁾，也就是说如这里尚不能说是“香港”这一域外景观的特殊性，还不能深入把握它的特征，就急急地把它归化到旧体系中了。而《上野博览会杂咏》中多数新事物的归化，又算不上优秀的诗歌，仅成了韵文写成的说明文。

第二，偶尔出现无法归化的事物。成岛柳北《航西裸诗》：

崎岖路在老岩间，落月断云相对间。怪兽有声人不语，火轮碾上绿魁山。（《过绿魁山二首》）²⁸⁾

以怪兽为形容火轮车，这的确比较生硬。其原因可能是在汉语中尚未找到相应的诗语来表达，这毕竟是两个文化体系的差距，对比成岛柳北《太平洋舟中之一》的归化就可以发现：“水滑天沈雨气冥，孤帆无力度苍溟。封姨蓦地吹云裂，满目晴蓝月亦青。”²⁹⁾ 风神“封姨”的神话为这首诗的归化带来了可能，成岛柳北完全不用涉及太平洋航船的现代文明的方面，但有“封姨”助阵，至少让眼前景观连类到旧的物类体系中去，而前一首的火车轮则没有找到相应的语词，只有用“怪物”来形容。

四、旅日诗人的新事物“归化”

明治时代汉诗人与黄遵宪等一批外交官诗人，互有来往，特别是在诗文创作，互相指点。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函》（光绪五年三月底于闰三月中，1879年4月下旬至5月初）：“前奉上拙著，想既改削，今再奉一本，有暇乞早速赐教为幸……”³⁰⁾ 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函》（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六日，1879年5月6日）：“《日本杂事诗》复承赐阅，感甚感甚……今再送上一本，乞尽

26) 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词华集·日本汉诗》第八卷（汲古书院，1983年），467页。

27) 郑毓瑜《1870年代中、日汉诗人的视域转换——以博物知识、博览会为认知框架的讨论》（台湾《淡江中文学报》，第二十五期，2011年12月），103-104页。

28) 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词华集·日本汉诗》第八卷（汲古书院，1983年），467页。

29) 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词华集·日本汉诗》第八卷（汲古书院，1983年），467页。

30)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297页。

一夕工夫削之……”³¹⁾《日本杂事诗·自序》则提到了更多参与评阅者：“(此篇)日本名宿重野成斋(安绎)、冈鹿门(千仞)、青山铁枪(延寿)、蒲生子阁(重章)诸君子皆手加评校,丹黄烂然,溢于简端。余为之易稿者四。”³²⁾而且黄遵宪本人还在《新文诗》上发表作品,为森春涛的儿子森槐南《补春天传奇》作序,这是中日两国汉诗人相互交往的事实³³⁾。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黄遵宪等人接受到了日本汉诗人归化策略。

首先,采用归化策略,是当时中国诗人的知识结构所决定的,这也是符合人的认知过程。如黄遵宪将西学归化到墨子之学,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五四首《西学》曰:

削木能飞翎鹤灵, 备梯坚守习羊铃; 不知尽是东来法, 欲废儒书读墨经。³⁴⁾

以墨家的学说来定位西方的科技,而且该诗的自注以及《日本国志·学术志一》都认为:“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可见这不是一时的态度,而是一以贯之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晚清学术界一个共同的倾向。晚清学者面对西学,需从旧有的知识体系中寻找根源,而《墨子》提供了这一资源。对于《墨子》的研究史可以看出,历代墨学书目中,战国至元代仅为10种,明代28种,而清代有60种,而且多数为中西接触以后的著作³⁵⁾,晚清的墨学大兴,正是这一思潮的体现。

这里要指出的是,“西学”的入诗,一方面固然是诗人用旧体系来诠释了新事物,同时还要注意的,诗人以“西学”为线索,将中国历史上散落各处的科技内容建构成一个体系,如黄遵宪该诗自注中,将《大戴礼》、《素问》、《春秋》、《淮南子》、《韩非子》、《后汉书》、《元史》等著作中的与西学观念相近的内容,梳理成一个脉络,仿佛中国传统的学术中,自有与西学相同的“渊源”。这一建构,其实就是扩大了中国文学中诗语世界的一角。

其次,这也是当时中国诗人的心态所决定的。考镜中国地理知识之源,海内地理知识当推《禹贡》,海外知识则发端于《山海经》。《尚书·禹贡》的九州、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观念体现出了由中心与边缘的“差序格局”思想,这样的地理图景,其实是政治教化为重点的伦理文化想象。《山海经》一方面是《禹贡》地理图景的扩大,并沿续其政治文化伦理的中心感,同时又是神话地理学,充满了对异域的各种想象。因此,《山海经》成了海外书写的重要资源,虽然荒诞不经,但与传统地理知识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天下图景。

而黄遵宪、何如璋(1838-1891,号子峨)、张斯桂(1817-1888,字鲁生)等旅日诗人,暗地里用了中心与边缘的差序格局思维。比如《日本杂事诗》甚至以“竹枝词”自命,如第二百首《尾声》:“纪事只闻筹海志,征文空诵送僧诗;未曾遍读《吾妻镜》,惭附和歌唱竹枝。”³⁶⁾并在自注中将自己的“杂事诗”与尤西堂《外国竹枝词》置于一处。今人王慎之、王子今所辑的《清代清外

31)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297页。

32)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5页。

33) 参见蔡毅《黄遵宪与文明开化诗》(《黄遵宪研究新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473-481页。该文以《新文诗》为主要材料,论述了黄遵宪与森春涛等日本汉诗人的交往,说明了文明开化诗对黄遵宪的影响。

34) 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注校点《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643页。

35) 据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附录一统计。

36) 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注校点《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789页。

竹枝词》也收录《日本杂事诗》。而“竹枝词”从宋代始，逐渐转化对于地方风物人情的书写了，里面就暗含着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其实是想象的——对边缘的俯视，采取了“采诗”以“观民风”的立场。《日本杂事诗》这种体式，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日本文化的俯视，是“采诗”“可以观”的文化中心立场。自处于中心，以荒唐的想象位置日本，想象着华/夷也即文明/野蛮的区分，这正是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常见现象。

再次，黄遵宪等人有着良好的文学素养，有能力找到强大的历史资源化作诗语。再比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三七首《印纸》：

剪纸频将花样翻，司农用印不辞烦；法同手实名头会，绝少催租吏到门。³⁷⁾

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源，给予诗人很多理解新事物的知识框架。“手实”，见于《新唐书·食货志一》、《宋史·食货上五》、《金史·食货一》等史书中，“头会”见于《淮南子·汜论训》等书，都是古代的税赋制度。再比如《日本杂事诗》第五〇首《病院》：

维摩丈室洁无尘，药鼎茶瓯布置匀；剖肺剖心窥脏象，终输扁鹊见垣人。³⁸⁾

其中“剖肺剖心”四字，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作“导脉竹筴”³⁹⁾，余英时《古代思想脉络中的医学观念》认为这“活人解剖”表明了“汉代医学家确实一直在认真地追求关于人体内部构造的知识。”⁴⁰⁾ 黄遵宪这个典故用来说明西医的解剖学。“扁鹊见垣人”也用了典故⁴¹⁾，“剖肺剖心、导脉竹筴”在原文中用以说明王莽的凶残，所以诗中“终输”两字，不只是中西医两种医术的高下，还带有道德批判的意味。诗语的熟练运用，达到极高的水平。再看张斯桂《观轻气球诗》一诗：

天空辽阔天宇高，谁能振翻去翱翔。泰西气球新样巧，轩轩霞举轻鸿毛。扶桑国里初学制，一球中径三丈计。翦穀为衣包举周，结绳为网纲维细。下系锦繖复藤床，中坐一人双旆扬。排空御气腾腾起，须臾直上白云乡。列子冷然风可御，西母众羣云絮絮。捷似王乔控鹤行，快如梅福乘鸾去。下界倾观齐拍手，人小如蚁球如斗。盘旋夭矯半空中，无翼而飞不胫走。高处生寒日色薄，俯瞰东京渺城郭。跳出人寰笑向天，把臂神仙遊碧落。转憾长绳系太牢，孤负亢龙意气豪。若将四维都解脱，十洲三岛任遊敖。一霎飞行数千里，崇朝大地皆週遭。沧海一粟土一撮，黑子弹丸俱抹撮。奇观如此空千秋，竖亥不步夸父渴。电激星驰瞥眼过，日轮月驭当头喝。只愁一阵黑风吹，随落罗刹难超拔。我因想入非非里，亦欲腾空驾云起。上穷霄汉问女牛，前有乘槎人到此。中途若复遇张星，还与联宗通姓氏。夜来飞入广寒

37) 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注校点《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624页。

38) 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注校点《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638页。

39) 事见班固《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中》（中华书局，1964年，第4145-4146页）：“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筴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40) 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三联书店，2012年），155页。

41) 事见司马迁《史记·扁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785页）：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

宫，香飘桂子我名同。前身合是主人翁，月姊相见话离衷。玉兔献我长生药，吴刚笑我不龙钟。听罢霓裳羽衣曲，抱得嫦娥下九重。⁴²⁾

轻气球后可以找出那么多有关飞天的典故成词。

五、新事物归化旧体系的意义

明治汉诗人首先使用了归化策略，中国诗人到达日本后，也采用了归化策略，来处理新事物与旧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这一归化策略，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也有重要的意义，上文已经提及，如建构科技的历史脉络，另有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新事物进入诗人的视域之后，新事物会冲击旧的体系，会反过来促进旧体系的演变。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一六首《蜻蜓洲》：

巨海茫茫浸四围，三山风引是耶非？蓬莱清浅经多少，依旧蜻蜓点水飞。⁴³⁾

对日本的地理定义产生了怀疑，“三山风引”一典见于《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⁴⁴⁾《汉书》卷二五《郊祀志》略同。《史记》、《列子》对三神山的踵事增华，其实是《山海经》知识系统的扩展。而黄遵宪则问：“是耶非？”而该诗的自注则肯定地说三神山“实则今日本地方”。开始对神话地理的怀疑，并试图坐实其真实位置。《日本杂事诗》第一九首《风俗》：

九州地脉阻昆仑，裨海环瀛水作门；圆峤方壶虽妄语，分明世外此桃源。⁴⁵⁾

也庶几相近，昆仑、裨海、圆峤等地名无不指向《山海经》神话地理知识框架，读者一入眼即如打开了一条通向诗歌喻旨的暗道，但是黄遵宪已经明确地说，这是“妄语”。至于“桃源”当然也是神话色彩的地方，但该诗的自注则说“四面环海，自德川氏主持锁港，益与诸国隔绝”，正是在“隔绝”的意义上，才使用“桃源”的典故——《桃花源记》云：“来此绝境……遂与外人间隔”。但从地理知识框架上看，黄遵宪已经开始调整《山海经》体系。

同样，何如璋《使东述略》也对三神山将信将疑，抵达日本长崎后，“沿岛徐行，恍入山阴道中，应接不暇。古所谓‘三神山’，是耶非耶？”⁴⁶⁾而其《使东杂咏》第五首：“缥缈仙山路竟通，停舟未信引回风。烟岚万叠波千顷，不在诗中即画中。”⁴⁷⁾则是反用《史记》之“风引”之说，而其注则谓“岂即古之所谓‘三神山’者耶？”

42) 石川鸿斋编《芝山一笑》(《中日诗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1页。

43) 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注校点《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605页。

44)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1369-1370页。

45) 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注校点《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608页。

46) 何如璋著，王晓秋标点《使东述略》(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91页。

47) 何如璋著，王晓秋标点《使东述略》(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110页。

第二，新事物归化时，借用一些旧语词，从而赋予旧语词以新意义。《日本杂事诗》第六首《明治维新》：

剑光重拂镜新磨，六百年来返太阿；方戴上枝归一日，纷纷民又唱共和。⁴⁸⁾

这里写王政复古，是中兴之功，而明治之后西学大兴，民众又有人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民权自由”。民权自由要进入旧体诗，用一个古汉语“共和”来归化它。此词原指西周自厉王败至于宣王立位期间，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政。事见《史记·周本纪》。很明显，这与日本当时的废藩置县，设立议院是非常不同的。从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的描述可知，他对西方的议院制度以及日本的议院制度都是非常了解。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共和”抽离了原来的语境，竟而成了一个现代汉语词汇，其概念也随之演变。

第三，新事物的归化，还可能引起对旧体系的重构。《日本杂事诗》第五首《留学生》：

化书奇器问新编，航海遥寻鬼谷贤。学得黎鞬归善眩，逢人鼓掌快谈天。⁴⁹⁾

这里的“谈天”也是一个旧语词，见于《史记·孟荀列传》，战国时齐人邹衍善言“天事”，故齐人称之为“谈天衍”，晚清士人常以“谈天”来归化西方传来的天文学，如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John Herschel) 1849年的著作《天文学纲要》，于1859年由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口述、李善兰删述而刊行了中文版，就是以《谈天》为题。黄遵宪此诗也是用“谈天”也指当时日本留学生所谈论的西方天文学说，而此词还出现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序言中“(中国士大夫)排斥谈天，诋为不经”，郑毓瑜认为此处“明显是借用邹衍融合五德终给与大九州的古代天文地理学作例子，来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所知狭隘，不能正确探寻古往今来与异域他方，往往藉口荒诞而不著意，以致于连距离中国这么近的日本也被忽略了。”⁵⁰⁾ 这种态度几乎是为邹衍学说翻案。从演变的角度看，西方天文学的归化为邹衍的“谈天”，似乎误解了西方天文学，但事情的另一面，则是将邹衍学说调整到与西方天文学的位置，那么这样一来，就会切断“天文地理”所牵涉的社会文化政治各个层面的联系。

48) 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注校点《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586页。

49) 黄遵宪著，钟叔河辑注校点《日本杂事诗广注》(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646页。

50) 郑毓瑜《类与物——古典诗文的“物”背景》(《清华学报》，新四十一卷第一期，2011年3月)，5页。